

# 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下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构建<sup>\*</sup>

刘凯娟

[内容摘要] 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为其成为海洋强国指明了方向，并规划了行动指南。在该战略下，中国不仅要注重资源开发能力、海洋科学技术等硬实力的发展，也需要重视海洋话语权等软实力的培养，从而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维护本国的海洋权益，进而建成海洋强国。中国的海洋话语权是其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构成。随着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推进及其对海洋全球治理的重视和参与，中国的海洋话语权有所提高。但同时，中国海洋话语权的提升仍然受到外部话语环境、话语客体与中国自身能力等多方面的挑战和限制。对此，中国可以通过调整和塑造外部话语环境、对话语客体采取不同的互动方式，以及丰富和提高自身海洋话语传播的策略和能力，以讲好自身的“海洋故事”。

[关键词] “海洋强国”战略；海洋命运共同体；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

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sup>①</sup>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首次提出该目标。<sup>②</sup>之后，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不断发展、深化。<sup>③</sup>在该战略的指导下，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也快速发展，管控、开发和保护海洋的综合实力持续增强。2022年，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并强调了要增强维护国家能力，维护海洋权益，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sup>④</sup>中国作为海洋大国，海洋对其的发展与安全愈加重要。<sup>⑤</sup>同时，自2013年起，习近平总书记就多场合、多形式地指出中国提高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2021年5月31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

\*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球海洋秩序重塑背景下的中国海洋安全话语体系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18BZZ043）的阶段性成果。

①《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胡锦涛同志代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载《人民日报》2012年11月9日，第2版。

②《盛世扬帆，乘风破浪正当时》，载《人民日报》2012年12月20日，第23版。

③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数次阐述和丰富了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强调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四个基本要求，即“四个转变”（详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 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载《人民日报》2013年8月1日，第1版）；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详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页）；等等。

④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⑤石羚：《建设海洋强国，用好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载《人民日报》2022年9月30日，第5版。

国叙事体系”，培育“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sup>①</sup>中国的海洋话语权是其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构成部分。由此，发展海上力量及培育同本国国际地位相符的海洋话语权对中国至关重要。

目前中国的海洋话语主要有“海洋命运共同体”“海上丝绸之路”等，国际社会对这些话语有所认同，但也仍有质疑的声音。中国还要明确构建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战略意义，明晰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内核，以及正确理解本国构建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现有基础与面临的挑战，从而找到有效提升本国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路径，进而为落实“海洋强国”战略保驾护航。

## 一、中国构建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战略意义

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②</sup>而构建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部署。中国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提升又反过来助力本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有利于协调好其建设海洋强国所要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

第一，当前海洋秩序的构建和重塑要借助更加公正、建设性的海洋话语的引导。事实证明，西方自由主义的权力话语和与之相关的实践并未完成构建公正、可持续的秩序的任务。<sup>③</sup>综合历史和现状来看，西方国家以马汉的“海权论”等为它们海洋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并在国际海洋话语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当前的海洋秩序中，西方国家是先行者，有话语优势，可以更大程度地引导合作议题、社会舆论等。而公正的海洋秩序的构建和重塑也需要听到发展中国家等后发型海洋国家的声音。中国要大力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海洋政治、安全合作，建构公正、包容的海洋关系，从而提升共同的话语权。<sup>④</sup>中国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等话语也可以发挥作用，中国亟须推动这类话语向话语权转化。

第二，全球治理的竞争性与大国博弈使话语等软实力的重要性突显。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资源的有限性愈发显著，相关国家之间的摩擦也不断增多。话语是行为体在地缘政治竞争中赢得利益和合法性的重要手段。<sup>⑤</sup>各国需要建构自身的海洋话语及提升传播能力，以增信释疑及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且，伙伴与盟友对大国博弈的进程和结果也至关重要。大国之间的竞争包括对追随者的争取。话语是话语主体争取追随者的重要助力。此外，全球治理的竞争性加剧，全球海洋治理的协商愈加浮于表面，真正的利益协调不易实现。<sup>⑥</sup>对此，中国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来弥合分歧，寻求和建构公正、说服力强、建设性的话语，以对相关行为体加以引导，进而改善上述局面。

第三，提升本国的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有利于中国改善周边的安全环境。冷战后，中国愈

<sup>①</sup>《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第1版。

<sup>②</sup>《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 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载《人民日报》2013年8月1日，第1版。

<sup>③</sup> Michael Karlberg, “The Power of Discourse and the Discourse of Power: Pursuing Peace through Discourse Interven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ace Studies*, 2005, 10(1), p.1.

<sup>④</sup> 贺鉴、王雪：《全球海洋治理视野下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2期。

<sup>⑤</sup> 王雪：《百年大变局下中国海洋话语权的提升：目标定位、限制因素与策略选择》，《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

<sup>⑥</sup> 例如，“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与“公海自由原则”的分歧曾阻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协商进程，当前也阻碍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国际协定的谈判。

加重视海上的维权维稳，将海洋利益视为国家利益的重要构成部分，以及注重海洋在维护国家利益中的重要作用。但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海上安全环境还是有所恶化。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受到以美国为代表的现有海洋强国的质疑和阻碍，它们开始共同大力“妖魔化”中国。<sup>①</sup> 美国恶意用“灰色地带”(grey zone)等名词定义、中伤和污蔑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这不仅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受损，还使中国在南海的合法维权行动遭受挑战。同时，美国的这一“污名化”策略亦迎合了南海问题中的其他相关国家，这些国家在美国的有意引导下开始认同甚至声援美国针对中国的消极叙事。美国也进而可以打着为这些国家考虑的幌子来利用它们达到自身想遏制中国的目的。对此，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亟须丰富自身的海洋话语和提升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以反驳这些恶意中伤，以及借助话语的力量与周边国家建立信任，从而营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

## 二、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内核

1980 年代末，国际关系领域出现“语言转向”后，“话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其在被引入国际关系领域包括海洋安全治理领域之后，不仅扩展了话语权的基本内核，也为解决相关的国际关系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 (一) 外交话语与国际话语权

“话语”(discourse)源于语言学范畴。语言表述形成的“话语”建构了人们的各种认知。语言学家沈开木主张，“话语是在交际的决策和框架的基础上经过大编码而产生的言语成品”<sup>②</sup>。詹姆斯·保罗·吉(James Paul Gee)认为，“话语”表现为使用中的语言或其延伸，而更深层意义上“作为人类本体性实践”时则指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依据合适的目标使用语言的方法，以及行动、交流等方法所达成的被社会认可的关系。<sup>③</sup> 话语会变迁，表现为生成新词、旧词新义等，其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构成与具体呈现。话语形成与变迁通常有三大路径，即话语继承、改造与独创。<sup>④</sup> 话语与语言、言语等密切相关，但更强调背后的价值观因素。

在国际关系领域，外交话语是以主权国家为主的外交实体为表述自身的战略和政策而运用的语言，<sup>⑤</sup> 应为“体现国家意识形态、重大利益等官方立场的表达”<sup>⑥</sup>。而且，一国外交话语的内容与表达亦会随着本国外交战略的改变、对外传播的需求而做出相应的调适。

国际话语权是一国在国际社会中以表明诉求、建构规范为目标，把自身话语融入国际话语体系的能力表现。<sup>⑦</sup> 具体到内涵，话语权是对国际事务的定义权，对国际标准、规则的制定权，以及对对错、责任的裁判权。<sup>⑧</sup> 同时，话语权是主体运用话语来左右客体的观念与行为的权利和

① Dino Patti Djalal, “ASEAN Responses to AUKUS Security Dynamic”, *East Asia Forum Quarterly*, 2021, Vol.13, No.4, p.18.

② 沈开木：《现代汉语话语语言学》，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2 页。

③ [美] 詹姆斯·保罗·吉：《话语分析导论：理论与方法》，杨炳钧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8 页。

④ 胡荣荣：《话语权与文化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 年第 5 期。

⑤ 金正昆：《现代外交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4 页。

⑥ 杨洁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话语权的使命与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16 年第 5 期。

⑦ 岳圣淞：《场域视角下的国际话语权：理论、现实与中国实践》，《当代亚太》2020 年第 4 期。

⑧ 梁凯音：《论中国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国际论坛》2009 年第 3 期。

权力。<sup>①</sup>话语权包括“话语权利”与“话语权力”两层含义。在国际关系中，前者是行为体所具有的话语自由，后者指某一行为体对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力。<sup>②</sup>国际话语权是话语权利与权力的合力，即话语资格与权威的合力。然而，有“权利”并不意味着就有“权力”。不管大小、强弱，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表达观点的自由。但国际话语权力是立足于硬权力之上的软权力。影响力与权力相辅相成。影响力的产生要以权力作为物质性支撑，但有硬权力也并不等同于有影响力。两者不是对等关系。

国际话语权主要有三大核心要素。其一，建构话语主体的身份。话语塑造了某些有意义的身份，唯有能承担这些身份的个体可以说话与行动，并不是所有的个体都能够承担所有的身份。<sup>③</sup>语言选择和语言本身都是身份建构的一部分。话语通常是动态的、多变的，行为体也相应有多重身份。话语主体通过语言的选择或语言的多样性向客体展示自身。同时，身份建构总是意味着包容和排斥的过程，即对自身和他者的定义。语言又被用来明晰相似性和差异性，在“我们”和“他者”之间划清界限。<sup>④</sup>其二，形成权力关系。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理论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对权力问题的关注。他主张话语下有难以想象的权力，人们争夺话语，就是在争夺权力，<sup>⑤</sup>从而可以塑造话语客体，使其受到制约，影响其话语行为、话语内容等。他还认为，权力关系的施展塑造了话语的规则系统，话语实践要遵循规则，话语的制造是受一定数量程序控制的。<sup>⑥</sup>其三，话语权大的行为体能更大程度地影响国际规范和游戏规则的制定。国际事务像是游戏，要在规则下有序进行。规则也决定了游戏的走向和行为体的输赢，而拥有较大话语权的国家能在规则制定中起到更大的影响作用。<sup>⑦</sup>

外交话语转化为国际话语权，需要“被听闻、被认同、被实践”<sup>⑧</sup>。而外交话语实践的考察要综合衡量话语主体、客体、内容、方式、平台与效果等因素，<sup>⑨</sup>特别是由于不同的话语客体受特定身份、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的影响，对同样的话语会有不同的解读和反应。

## （二）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对话语权要素的扩展

一国的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是其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构成部分，具体指海洋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因此，“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这一概念的内涵既包括国际话语权的基本要素，又结合海洋安全事务而拓展了具体指向，包括行为体就某一海洋安全事务发表观点的自由，其话语对该安全事务发展的影响力（引导海域舆论、化解海上话语危机、塑造海洋安全规范、建构海洋安全秩序），等等。此外，海洋是跨越国界和互联互通的，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也就在空间层面有所

<sup>①</sup> 骆郁廷、史姗姗：《论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的文化话语权》，《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年第4期。

<sup>②</sup> 杨洁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话语权的使命与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5期。

<sup>③</sup> Cynthia Hardy and Steve Maguire, “Organizing Risk: Discourse, Power, and ‘Riskification’”,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6, Vol.41, No.1, p.84.

<sup>④</sup> Ruth Wodak, “Language, Power and Identity”, *Language Teaching*, 2012, Vol.45, No.2, p.216.

<sup>⑤</sup> [法]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载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sup>⑥</sup> 同上书，第3页。

<sup>⑦</sup> 赵宁宁：《中国北极治理话语权：现实挑战与提升路径》，《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2期。

<sup>⑧</sup> 叶淑兰：《中国外交话语权的历史演进、基本经验及生成逻辑》，《国际观察》2021年第5期。

<sup>⑨</sup> 刘凯娟、郑先武：《外交话语与澜湄合作规范建设》，《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7期。

扩展，具有全球性。因此，海洋话语的主体与客体是庞大的，多元的话语主体及其海洋安全倡议要说服和适用的话语客体也很有可能是数量庞大的。海洋安全领域的权力关系和话语博弈纷繁复杂。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本国海洋权益的维护情况。

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竞争集中发生在主权国家之间。早期的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竞争主要取决于各国的海军实力、海洋开发利用能力等硬实力，但现阶段各国进行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竞争时更依赖海洋话语之间的博弈，各国也都在有意识地建构蕴含自身价值观的海洋话语。当然还要注意的是，各国的海洋利益也密切相关，综合考虑本国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海洋话语更容易赢得认可和被接受。

### 三、中国构建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现有基础与影响因素

中国已经意识到构建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开展了丰富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国的“海洋命运共同体”“海上丝绸之路”等海洋话语已在国际社会获得广泛认同，但同时中国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提升仍面临着不少挑战或受到一些限制。

#### (一) 中国构建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现有基础

安全保障、利益维护与发展需要是中国构建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重要出发点。中国海洋话语权的构建可追溯到 1950 年代就南沙群岛主权与领海的声明，<sup>①</sup>之后中国的海洋话语权不断提升。

##### 1. 中国构建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战略和理论基础

习近平海洋强国战略思想是当前中国构建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重要指导战略和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sup>②</sup>习近平海洋强国战略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海洋思想。毛泽东对建立人民海军作过很多指示，在给初建的华东军区海军所作的题词中指出“要建设一支海军”“保卫我们的海防”。<sup>③</sup>邓小平结合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我们建设海军基本上是防御”，提出“近海作战”战略，且认为建设的海军力量“要顶用，要精，要真正是现代化的东西”。<sup>④</sup>此外，他还提出了“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sup>⑤</sup>的应对争端的建议。江泽民在 2002 年 3 月听取海南省人大代表汇报工作时就明确指出“建设海洋强国是新时期的一项重要历史任务”。<sup>⑥</sup>胡锦涛提出了建设“和谐海洋”的战略思想，指出其是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开展国际海上安全合作”。<sup>⑦</sup>这些海洋观都是习近平海洋强国战略的养分来源。此外，中国传统海洋文化中的精华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洋思想都对习近平海洋强国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其中，中国传统海洋文化中的精华包括管仲的“官山

<sup>①</sup> 王雪：《百年大变局下中国海洋话语权的提升：目标定位、限制因素与策略选择》，《国际论坛》2022 年第 3 期。

<sup>②</sup> 林善炜：《习近平海洋强国战略思想的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理论视野》2023 年第 7 期。

<sup>③</sup> 吴殿卿、袁永安、赵小平主编：《毛泽东与海军将领》，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11 页。

<sup>④</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42 页。

<sup>⑤</sup>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9 页。

<sup>⑥</sup> 彭克慧：《新中国海洋战略发展史》，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88 页。

<sup>⑦</sup> 《胡锦涛会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60 周年庆典活动的 29 国海军代表团团长》，载《人民日报》2009 年 4 月 24 日，第 1 版。

海”<sup>①</sup>、孙中山的“兴海权，振中华”<sup>②</sup>等；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洋思想主张海运等海洋经济改变了社会的生产形态，分析了基于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的海权建构，认为海军是新的强国象征和海权的保障。<sup>③</sup>这些海洋观为习近平海洋强国战略在海洋经济建设、海军建设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

## 2. 中国构建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实践成就

中国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提升是经由机制安排，使中国的海洋安全话语成为国际共识甚至安全规范、规则的过程。15世纪初就在印度洋上巡游的郑和船队的中国船只与16世纪的欧洲船只相比也仍具有优势，<sup>④</sup>然而古代中国由于缺乏海洋意识等原因并没有把握住大航海时代的发展机会，也很少参与早期海洋安全规范、制度的制定，以及海洋秩序的构建。新时代，中国积极参与了海洋安全规范、制度的制定与适用，<sup>⑤</sup>以及推动建设更公正合理的海洋秩序，贡献了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

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可以借助提供海洋治理公共产品来提升。中国不断通过理论阐释和实践案例证实了“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有利于解决海洋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协调问题。中国也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及平等协作等话语发展相关海上合作，并借助这些合作平台提升本国的海洋话语权。2021年7月，海洋共同体研讨会暨“一带一路”海上互联互通绿色发展研究启动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在该会议上宣传了本国在绿色港口建设和运营方面的经验和良好做法。<sup>⑥</sup>中国亦在2023年连续第18次成为国际海事组织的A类理事国，<sup>⑦</sup>中国已经批准了国际海事组织框架下的几乎所有条约，是至少40多项国际公约的缔约国。<sup>⑧</sup>中国还利用话语持续强调南海“历史性权利”、领海无害通过事先批准制度等，以维护本国利益，并取得成效。例如，2018年，越南就在中国的话语压力下命令西班牙雷普索尔（Repsol）公司暂停其在越南东南沿海的“红帝”（Red Emperor）项目。<sup>⑨</sup>

作为话语主体，中国在构建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中，其秉持的价值观也得到传播。在海洋

<sup>①</sup> “官山海”，详见于春秋齐国管仲《管子·海王》：“唯官山海为可耳”，指可由国家控制山林川泽之利。

<sup>②</sup>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64页。

<sup>③</sup> 参见刘学坤：《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洋政治观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sup>④</sup> Janet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1250–13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353.

<sup>⑤</sup>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呼吁准确完整地解释和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22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30/content\\_5688210.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30/content_5688210.htm)，最后浏览日期：2024年5月26日。

<sup>⑥</sup> Belt and Road Portal, “Representatives Call for Green Maritime Connectivity Under BRI” (July 19, 2021), World-Energy, <https://www.world-energy.org/article/19059.html>, retrieved February 15, 2024.

<sup>⑦</sup> 《中国连续第18次当选国际海事组织A类理事国》（2023年12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网站，<https://www.msa.gov.cn/page/article.do?articleId=EF9624F9-4A90-468D-985A-254E8C88D5D5&channelId=A1C5D4CC-DB15-493C-B2FC-A14C490D6331>，最后浏览日期：2024年2月10日。

<sup>⑧</sup> Liu Xiaoming, “Speech by H.E. Ambassador Liu Xiaoming at the Receptio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31st Regular Session of the Assembly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Build a Maritim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rough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operation” (November 26, 2019),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http://www.chinese-embassy.org.uk/eng/ambassador/dsjhjcf/2019dashijianghua/201911/t20191127\\_3385551.htm](http://www.chinese-embassy.org.uk/eng/ambassador/dsjhjcf/2019dashijianghua/201911/t20191127_3385551.htm), retrieved February 15, 2024.

<sup>⑨</sup> Martin Sebastian, “China’s Gray Zone Opera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anipulating Weaknesses”, in Leszek Buszynski and Do Thanh Hai, eds., *Maritime Issues and Regional Order in the Indo-Pacific*,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p.47.

安全领域，“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sup>①</sup>。不同于美国内含霸权思维的海洋话语，中国追求平等协作、互利共赢，主张“海洋命运共同体”，提出的是共建共享的海洋治理观。

## （二）中国构建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影响因素

中国的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具有提升潜力的同时也受到如下因素的影响。

### 1. 复杂的外部话语环境带来的挑战

中国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构建面临着复杂的话语环境。

首先，当前海洋领域的整体话语舆论环境容易偏向竞争，而非合作。现阶段国际社会的大环境愈加偏向竞争，大国博弈也在不断发力，国家间的合作动力容易后劲不足。此时，中国追求平等协作、互利共赢的海洋话语需要有更强的说服力才能被认同。中国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构建也要根据大国话语权竞争的形势变化而做出调整。同时，海洋资源的稀缺性使相关国家间较易形成竞争，特别是国际社会仍有较多与岛礁主权、海域管辖权等相关的争端，各国对其他国家构建本国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行动容易敏感多疑。

其次，中国周边海洋问题的话语舆论持续增压。中国周边也有较多的海上争端，其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构建处在一个复杂的话语环境中。一些周边国家的污蔑、抹黑等会给中国造成舆论危机。2016年，菲律宾推动下的“南海仲裁裁决”（以下简称“裁决”）恶化了中国的海洋话语环境，且还留有隐患。中国于2021年9月起遵行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sup>②</sup>引发少数周边国家怀疑中国的意图。对于周边这些话语舆论压力，中国要时刻警惕，并争取预见性地用好本国的海洋话语，利用多平台、多途径与周边国家增信释疑。

最后，短期内西方国家具有话语优势的现状不会改变。西方国家是海洋领域的先行者，它们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就在海洋领域具有话语优势，也就对现行海洋规范、法规、秩序的影响较大。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西方话语占优势的海洋话语体系还会存在并发挥作用，现阶段发展中国家仍难以改变这一现状。英美习语与世界主流的政治话语有不可分割的联系。<sup>③</sup>由此，中国对本国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构建还要考虑到西化的语境，这无疑增大了中国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构建难度。

### 2. 话语客体的阻碍

随着中国更积极地参与海洋治理及发挥影响力，其在发出声音的同时与话语客体产生分歧的可能性也在增多。部分话语客体阻碍了中国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构建，且不同话语客体对中国形成的阻力也有所不同。

其一，美国以霸权护持的消极叙事阻碍了中国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构建。美国的政府、媒体等共同发力，并凭借其话语优势，针对中国进行消极的海洋叙事。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美国无视中国在南海的正当利益诉求，致力于捏造中国的消极形象，不断鼓吹“中国威胁论”。

<sup>①</sup>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12页。

<sup>②</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2021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s://www.gov.cn/xinwen/2021-04/30/content\\_5604045.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1-04/30/content_5604045.htm)，最后浏览日期：2024年2月10日。

<sup>③</sup> Giovanna Borradori, *Philosophy in a Time of Terror: Dialogues with Jürgen Habermas and Jacques Derrida*,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p.88.

近年来，美国根据自身需要，又开始污蔑中国为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sup>①</sup>无端指责中国对海洋秩序的挑战。而美国针对中国的消极叙事因为有其话语优势的加持就会传播更快、影响更大，也就极大地阻碍了中国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构建。

其二，一些周边国家由于与中国存在争端、理念分歧等原因而阻碍中国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构建。与中国的海洋事务更相关的国家主要是中国的周边国家。如前所述，2016年的“裁决”给中国的海洋话语环境留有隐患。2023年8月，菲律宾还拿“裁决”说事，其为了给非法“坐滩”军舰输送物资而派船闯入仁爱礁海域。<sup>②</sup>而且，另有一些南海国家也开始借用和效仿这一“法理”工具来索取权利，如马来西亚于2019年向联合国提出了把本国大陆架延伸至200海里以外的照会。由此，中国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构建要承受更恶劣的周边舆情与更强的“法理”压力。

### 3. 中国的话语能力对自身构建话语权的限制

中国自身的话语能力也对构建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构成了一定限制。

第一，中国的海洋话语体系尚不完备。中国是海洋领域的后来者，其对某些海洋行为主体、海洋事务的定义都还不完善，也就容易面临话语“被塑”的困境，进而导致中国主题他议、国家形象他塑的局面。例如，中国在南海活动的渔民与渔船还没有清晰的国内法界定，许多西方分析家就称其为中国“海上民兵”(maritime militia)。美国国防部认为，中国“海上民兵”是一支可供动员的平民武装后备力量，其与中国海军、中国海岸警卫队一起训练，并协助他们执行维护海洋主权、监视和侦察、渔业保护等任务。<sup>③</sup>菲律宾政府表示，中国“海上民兵”在南海的持续存在表明中国有意“占领”该区域。<sup>④</sup>因为对本国在南海活动的渔民与渔船缺少“命名”和“定义”，中国就陷入了被动的局面，中国渔民的一些正常、普通的渔业活动也容易被上升为国家行为，从而影响中国与南海相关国家的互信。

第二，中国海洋话语与世界海洋话语的对接仍然存有改进空间。西方国家是海洋领域的先行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西方话语占优势的海洋话语体系还会存在并发挥作用。而因为自身独特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等，中国要想获得更多的认同及提升本国的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就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否则，西方国家就会或者排斥与自身制度不同的国家，或者根据历史经验（如西方国家“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和苏联经验等）来解读和判断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走向，从而不认可中国会“和平崛起”。因此，中国海洋话语的建构要能够对接西化的语境。然而，由于与西方国家语种不同、叙事风格较为委婉，以及习惯采用先道理、后叙实的话语方式

<sup>①</sup>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February 4, 2021),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 retrieved February 12, 2024;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3, 2021),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03/interim-national-security-strategic-guidance/>, retrieved February 15, 2024.

<sup>②</sup>《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国务院发表关于仁爱礁问题的声明答记者问》，载《人民日报》2023年8月8日，第12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仁爱礁有关问题答记者问》，载《人民日报》2023年8月9日，第15版。

<sup>③</sup>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on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3” (October 19, 2023),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media.defense.gov/2023/Oct/19/2003323409/-1/-1/2023-MILITARY-AND-SECURITY-DEVELOPMENTS-INVOLVING-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PDF>, p.80, retrieved February 15, 2024.

<sup>④</sup> Mark Valencia, “South China Sea: US-China Rivalry Leaves Whitsun Reef and the Philippines in Deep and Dangerous Waters” (April 16, 2021), China Daily,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2104/16/WS60b6fd73a31024ad0bac315a.html>, retrieved February 15, 2024.

等原因，中国海洋话语与世界海洋话语的对接仍然存在错位，这不仅会阻碍本国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构建，还容易引起外界的猜疑。

#### 四、中国构建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路径

中国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构建有其基础，也面临挑战。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在不断的发展完善中。在此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可以通过以下路径来构建和提升本国的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

##### (一) 调整和塑造海洋话语传播的外部话语环境

中国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有其施展作用的话语环境，中国需要对该话语环境进行一定的回应与经营，从而有助于本国话语权的提升。第一，中国可以借助联合国框架下的海洋话语平台进行“话语突显”(discourse salience)，通过中国方案为海洋治理增加合作动力。<sup>①</sup>当前大国博弈也影响了海洋领域的合作氛围，中国可以借助联合国框架下的会议、论坛等平台推进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的沟通，以进行“话语突显”。中国在支持联合国涉海机构的工作的过程中也能扩大本国海洋话语的客体范围，并有更大可能和更大程度获得客体对中国海洋话语的创新性、科学性的认同和接受。中国可以在广泛参加联合国架构下的区域海洋方案、海洋生态系统机制等的进程中，积极开拓它们与“海上丝绸之路”交流合作的机遇。

第二，面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科垄断及西方话语因此具有的优势，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要付出努力以寻求突破口来破解这一局面。在阐述本国“海洋命运共同体”等涉海倡议方案时，中国也可以更倾向从学理方面多论述它们的理论创新点和前瞻性，并利用科学性的论证来提升其可靠性。此外，针对一些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自身利益等的引导下对中国做出的不符合实际的命名、定义和论述等，中国应通过加强历史和现状研究以破解其学理基础。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经常使用创建新概念来“命名”的手段，而中国应该尽量以国际法术语去反驳美国，而不是用美国创建的概念来为自己辩护，否则就在一定意义上等于先认可了美国主张的合法性，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辩护也就会一直处于被动状态。

##### (二) 采取差异化的话语客体互动方式

不同的话语客体给中国构建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造成的阻碍是不同的，中国要明晰其中的差别，进而对于主导性海洋强国与周边海洋国家对应地采取不同的话语客体互动方式。

现阶段中美两国在南海与台湾问题上呈现出较强的博弈性，双方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海上合作的阻力仍然很大，但仍有可能进行危机管控的相关对话。两国需要对这两大热点问题都强化危机管控机制建设，并维持对话，尽力防止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战略误判并进而引起争端。中美两国也可以建立一些协调机制，探讨新型的海洋合作方式。中国政府要拓展战略视野，以及中美民间社会要加强互动，以重塑中美叙事空间、调整“准悲剧式”的身份认同竞争。<sup>②</sup>引导民意在美国是公开、合法的竞争游戏，中国亦可以结合本国的国情加以效仿，即聘用专业的公关

<sup>①</sup> 王雪：《百年大变局下中国海洋话语权的提升：目标定位、限制因素与策略选择》，《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

<sup>②</sup> 曹德军：《大国竞争中的战略叙事——中美外交话语博弈及其叙事剧本》，《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5期。

机构来辅助民意竞争，<sup>①</sup>进而使双方避免因海洋文化差异而产生误解。

对于周边的海洋国家，中国可以加强经济合作，亦重视推进民间交流以实现民心联通，具体可以落实到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把“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的海洋经济合作作为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的立足点。中国与其他国家塑造共同话语，以及构建“蓝色伙伴关系”，都需要以拓展共同利益为基础。其次，创新与周边海洋国家合作的思路，重视自下而上的路径。中国要尽力合理发挥二轨交流平台的作用，综合使用正式与非正式机制，特别是发挥以民促官的效力，实现海洋话语的良性互动。最后，从法理视角回应南海相关国家的疑虑。周边部分海洋国家已经对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和自2021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产生了负面舆论，中国要根据法理与实际情况做出适当回应以增信释疑。

此外，中国可以针对不同话语客体对本国的现有评价来决定“海洋命运共同体”等话语的优先传播方向。要采取贴近不同区域、国家与群体的精确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声音的全球化、区域化与分众化表达。<sup>②</sup>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1年6月的报告，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看法也徘徊在历史高点附近。<sup>③</sup>而在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中东和北非区域，更多人对中国影响力的评价通常高于对美国的评价。<sup>④</sup>由此可见，中国可先与这些区域的发展中国家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和“蓝色伙伴关系”，因为与这些区域国家的话语互动的阻力会相对较小。

### （三）丰富和提高海洋话语传播的策略和能力

丰富和提高自身海洋话语传播的策略和能力的具体路径如下。

首先，创新和丰富海洋话语内容。中国需要丰富本国的海洋话语内容以回应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构建海洋话语权的相关行动的质疑，如其亟须从法律方面就本国渔民与渔船及其海域活动做出回应和定义，以及从法理和实践出发解释“南海断续线”“历史性权利”等术语。同时，中国的海洋话语也应由被动回应转为主动创新话语、设置海洋议题等。中国要将“海洋命运共同体”等海洋话语的内容更系统化，要创新且精准地定义其相关概念。这也就需要中国提高透明度、做出承诺并采取具体行动。“话语框定”是进行海洋议题设置的重要路径，如对于海上安全等议题，中国可以通过“话语框定”使这一议题更容易引起各国的重视并推进问题解决。

其次，促进中国海洋话语和世界海洋话语对接。中国模式给新世界秩序带来了新价值元素。<sup>⑤</sup>但是，中国的海洋话语如果过于突出特色就不易被其他国家所理解，但其过于注重共性也会失去本国的特色，所以中国的海洋话语权构建要兼顾中国“特色”与世界“共性”。而且，

<sup>①</sup> 吴旭：《西方为什么误读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年版，第54页。

<sup>②</sup>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第1版。

<sup>③</sup> Laura Silver, Kat Devlin and Christine Huang, “Large Majorities Say China Does Not Respect the Personal Freedoms of Its People” (June 30, 2021),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wp-content/uploads/sites/2/2021/06/PG\\_2021.06.30\\_Global-Views-China\\_FINAL.pdf](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wp-content/uploads/sites/2/2021/06/PG_2021.06.30_Global-Views-China_FINAL.pdf), retrieved February 15, 2024.

<sup>④</sup> Laura Silver, Kat Devlin and Christine Hua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Mostly Welcomed in Emerging Markets, but Neighbors Wary of Its Influence” (December 5, 2019),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9/12/05/chinas-economic-growth-mostly-welcomed-in-emerging-markets-but-neighbors-wary-of-its-influence/>, retrieved February 15, 2024.

<sup>⑤</sup> 张蕴岭：《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年版，第120页。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各国的海洋话语在传播过程中也可以实现互补。这有助于促进中国海洋话语和世界海洋话语的对接。同时，中国也要转变话语方式。中国应加强对其他国家官方和民众思维的了解，从他者出发“讲述故事”，以获得这些国家对中国海洋话语的认同和支持。

## 五、结语

安全事务话语权的取得并不是单纯地依靠国家实力就能实现的，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与中国海上话语安全环境的变化之对比强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国“海洋强国”的建设离不开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构建。中国寻求构建与本国国际地位相符、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海上话语安全环境，以及有助于推动海洋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当前中国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构建具有不断完善的战略和理论基础，也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实践成就和经验。但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构建海洋强国的行动一直保持着戒备，并试图营造不利于中国软实力提升的舆论环境。<sup>①</sup>再加上一些周边海洋国家的过度反应，中国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构建面临不小的挑战和阻碍。对此，中国可以通过讲好自身的“海洋故事”，调整和塑造外部话语环境，改变与话语客体的多元互动方式，以及丰富和完善自身海洋话语传播的策略和能力等路径，推进中国海洋安全事务话语权的构建。

作者系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邮基地特约研究员

<sup>①</sup> 周英：《论西方对中国软实力的认知与反应》，《国际论坛》2021年第5期。